

安源党校——

中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党校

□ 张 丹

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校工作。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1924年12月，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推动下，安源党校在江西萍乡诞生。在存续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安源党校注重从革命实际出发，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对推动党的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适应革命需要而创办

党在创建初期就对开展党内教育提出了鲜明主张。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遭到镇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一些对革命悲观、消极的想法，中共中央总结原因，其一就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上指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鉴于此，党、团中央决定委派特派员对工人运动的重要区域进行巡视，着重对党、团组织内部的训练给予指导。

位于湘赣边界的江西安源，历史上以盛产煤而著称于世。1921年秋冬，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路矿考察工人运动状况，随后确定安源作为湘区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两个重点区域之一。1922年上半年，伴随着安源党、团组织和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安源工人的革命运动逐渐兴起。1922年9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组织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二七惨案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依然坚持斗争，党、团组织也基于此迅速发展壮大。为提升内部战斗力，巩固革命成果，1924年夏，中共中央执委、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蔡和森到安源巡视，指导党、团组织工作。同年8月，团中央局常委、宣传部主任兼学生部主任恽代英来安源巡视，指出工人群众对党“非深切了解”，强调党、团同志要“极力注意教育”。11月初，团中央执委、特派员林育南巡视安源达半个月之久，指示安源团组织要“加倍努力于训练教育”。

有了自身的发展和上级的指导，



安源党校旧址（八十间）

到党的四大前夕，安源党、团成员短时间内大量增加，中共安源党、团地委成为全国地方规模最大的党、团基层组织。党、团规模的急剧扩大一时间出现了指导人才不足的困境，加之新入党的党员虽然有实际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但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基本知识也十分缺乏，有迫切成立专门的党校“培养人才之必要”。遵照中央指示，1924年11月，安源党、团地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同年12月底，安源党校在中共安源地委活动地之一的“八十间”正式开办，不久后搬到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内办学。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办学

安源党校由中共安源地委创办。刘少奇、汪泽楷、萧劲光、胡士廉等共产党员任教员，他们当时均为地方党、团、工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是党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有力保障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办学方向。教员在教学中注重向学员“灌输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刘少奇给学生上课通俗易懂、思想性强，向学员讲授“剩余价值”时，他联系苦难矿工自身所得工资的实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教育学员要“有责任去拯救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砸碎这万恶的旧制度”。学员回忆“少奇同志讲课深入浅出，使同学们很受教育”。

安源党校办学时根据学员文化水平高低进行分班教学，低级班“专收工友同志”，高级班“专收学生同志”

（党员、团员）。开办时各班招收30人，每周授课3次，每次授课2小时。后两班合为一班。教学内容突出政治教育和党史教育，开设课程主要有瞿秋白、王一飞合译的《政治经济浅说》（《政治常识》），以及《俄共党史》、《大学史》（中共党史）、《少年史》等。曾任工人俱乐部杂务员、安源老工人易友德回忆在党校学习的经历，“主要是教社会进化，从原始——渔猎——畜牧——农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经济的进化，工业的发展，国家的工具”。课上还会及时学习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大会精神。此外，党校教室的正面墙上还张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伟大革命家的画像，用以激励学员，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促使安源工人“团结、齐心、奋斗”，推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工人运动低潮期“巍然独存”。

为规范学习、提升质量，党校在教学中对内部教育提出具体标准，对学习内容的次数也作出具体要求，如组织训练教育5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4次等。针对一些学生成绩不甚如意的状况，安源党、团组织积极设法整顿，采取“先进”拉“后进”的方式，对“不明了之同志，多加指导”。经过整顿，教学效果明显提升，“成绩尚好”。

培养革命骨干撒播火种

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北洋军阀武装镇压，安源党校被迫

停办。安源党校共创办两期，学员约90余名。虽然存续时间不长，安源党校有力传播了党的革命理论，为党早期的革命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骨干人才，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事业的创办和发展探索了重要经验。

安源党校当时就是为解决安源党、团组织因队伍壮大需要“培养人才”而设，培养对象不仅有工人党员，也有党、团组织中的骨干力量。如培养了黄五一、涂正楚、袁德生等一批革命骨干，他们离开安源后在外地的党、团组织中担任重要岗位。还有罗寿如、胡子厚等部分学员赴苏联深造，曾担任过工人俱乐部“百代表”的株萍铁路老工人刘清华回忆，“宁迪卿、胡子厚等都在党校学习过，在党校学习的后来抽了十几个去俄国学习”，他们回国后又在党、团组织中从事重要工作。安源党校还为湘鄂皖等周围省份输送了一批领导工农运动的骨干，如汪先宗、石作珍、梅大栋等。经过党校教育，坚定了学员的革命理想信念，卢春山、周怀德等优秀学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安源党校培养训练的一批革命骨干，为党早期的工农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领导力量支撑。

作为党的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的红色薪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校工作中得到传承发展。大革命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纷纷成立党校培养人才，如1925年3月，长沙团地委与“C.P.合办党校，作特殊的教育”，为湘赣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工农运动培养了革命力量。其他革命区域的党校也采用分层次办低级、高级班，注重配备优秀师资等办学模式，如上海区委要求“办党校专刊，各部委办高低级训练班”，直接明确党校“教员要好点的”等，大大提高了革命时期党校事业的办学水平。

安源党校百年峥嵘岁月，百年党校初心历久弥坚。在红色党校的基因传承中激励我们始终坚守、积极践行党校初心，奋力推进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红色记忆

“一口香”里情意长

□ 李 蔚

怀念家乡，怀念的常常是家乡的一种味道。如果说汪曾祺的乡愁，附着在了高邮的咸鸭蛋上，鲁迅的乡愁，蕴含在了绍兴的茴香豆里，那么我的乡愁，便都化在了扶风的“一口香”臊子面中。

我的家乡小城扶风地处陕西关中西府，这里是古周原的属地，农耕文明源远流长。肥沃的黄土地上，盛产出籽粒饱满的冬小麦，因而这里的面食筋道爽口，别具风味，“一口香”臊子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扶风周风习习，古韵悠长，“一口香”臊子面也被雅称为“文王面”，里面深藏着历史的醇厚滋味。传说某日，在渭水河畔打猎的周文王，勇猛地射杀了一只兴风作浪、祸害百姓的蛟龙。“爱民如子”的他命厨师把蛟龙肉切成小块，做成臊子入汤，放入煮熟的面条大宴百姓。蛟龙肉难觅，后来人们便选用本地的猪肉做成臊子，直至今日。

“一口香”，顾名思义，一碗面便是一口的量，而这一口，就已让你香入魂，回味无穷。吃“一口香”时，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数数自己到底吃了多少碗，看看谁能在这“数碗挑战赛”中拔得头筹！对于年轻小伙子而言，一顿二三十碗，绝不在话

下。“一口香”，汤底是关键，以香醋炆锅调汤，放入肉臊子，再加入炸豆腐、生葱等漂菜，待面条煮熟后浇上热汤，主打一个面“薄、筋、光”，汤“煎、稀、汪”，味道则是“酸、鲜、香”。

我最怀念的，莫过于外婆亲手烹制的“一口香”。它如同时间的钥匙，轻轻一转，便开启了我美好童年的记忆之门。小时候的我，总是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外婆做“一口香”中的炸豆腐。起锅烧油，薄薄的豆腐片刚下锅时，似乎还在热身，懒洋洋的，不怎么愿意动。然而随着油温的升高，噼里啪啦的声音逐渐响起，豆腐片在锅里活泼起来，四边儿微微翘起，变得干干脆脆。在菜籽油的浸润下，白色的豆腐片裹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外衣。每当这个时候，外婆便会用筷子，仔仔细细地夹出外衣颜色最漂亮、让我尝到这香香润润的第一口。

在外婆家吃“一口香”时，有两件颇有些仪式感的事。汤调好了，面煮好了，就在这要吃的当口，外婆总会嘱咐我一句：“先去门口泼一下。”其实就是把碗中的汤，往家门口的地上倾洒一点儿。小时候不懂，为何这

香喷喷的“一口香”做好了，我们不能先吃，却还要加上这样一个动作？待我长大后才明白，这简单的行为，是一种祭祖的仪式，希望先祖可以率先品尝到这份人间美味。我们满怀敬意，以美食为媒，传递着对先祖的尊崇与思念。

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外婆也会做“一口香”招待。刚吃了头几碗后，我便可以向外婆领取第二项任务了，就是赶紧跑去问候客人：“味道怎么样？”随后，我带着反馈，一溜烟奔回厨房，或是“醋重了”，或是“盐有些淡”。外婆就会根据客人需求，迅速在汤中做出口味的调整。当然，大多数时候，客人们都会回应一句“好着呢，美滴很”，对外婆的厨艺予以肯定。我曾经问过外婆：“我们自己尝尝味道就知道好不好了，为什么要次次不落地问客人？”外婆一边捞面，一边一字一句认真地说道：“这是对客人的尊重，礼数不能省的。”原来，古周原的礼制文明，并非遥不可及的高深学问，而是深深根植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饭一蔬中，历久不衰。

在扶风，不论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大家围坐一处，席面上必定少不了“一口香”的身影。一碗接一

碗的“一口香”上桌，谁手中的“一口香”吃完了，马上会有旁人，把自己手边新上的“一口香”推让过去。人们吃着香喷喷的“一口香”，交流着共通的情感。仿佛一道无形的桥梁，“一口香”连接着家乡父老之间那份最为真挚、朴实的情谊。

现如今，“一口香”已经化作了小城的味蕾使者，成为扶风文旅的一张美食名片。听家乡的朋友说，前不久，扶风刚举办了“一口香”臊子面大赛，厨师们使出了看家本领，现场比拼制作技艺。上次回家，路过一条美食街，家家户户都竖着“扶风‘一口香’”的招牌。正值小长假之时，街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人们从店里心满意足地走出，脸上挂着笑意。大家品的是周原味道，念的是家乡情怀。

过几天，我准备回家看外婆，这次，换我给外婆露一手，做一次“一口香”了。这就是亲情的传承、文化的传承。



自得园

作为至圣先师、儒家始祖，孔子务实入世、乐观通透，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不乏丰富的处世学问。

行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参以“忠恕”二字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之道可一分为二，一为“忠”，孔子说：“与人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司马光说：“尽心于人曰忠。”“忠”是要求人发自内心的、竭尽全力地待人处事，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好道德责任。一为“恕”。孔子曾对恕作过解释，他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家语》记载，孔子雨天出行，没有车盖，有人告诉他子夏有。孔子说：“我听说与人交往要发扬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子夏这个人吝惜财物，我向他借车盖，如果他不借给我，会有人说他小气，不尊敬师长，如果借给我，他自己又会心疼。”孔子从子夏的角度考虑，包容他的缺点，没有向他借车盖，此为“恕”。忠恕之道体现了孔子悲悯、包容、豁达的胸怀。

分善恶之别。孔子主张仁爱、中庸，但他并非老好人。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正的仁者能正确对待是非善恶，爱憎分明。《论语·子路》记载，学生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曰：“未可也。”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又答：“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这里，孔子提倡树立一种“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的观念。孔子本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对于表里不一、伪善逢迎的“乡原”一类人，他直呼：“乡原，德之贼也”；对于学生冉求帮助富可敌国、把持政权的鲁国大夫季氏敛财的行为，他扬言：“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季氏“八佾舞于庭”这种僭越周礼的行为，他痛斥：“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对于不懂孝悌、无所成就、坐没坐相的原壤，他训诫之余“以杖叩其胫”。齐鲁两国夹谷会盟，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兼任会盟的司仪，面对齐国对鲁定公加以羞辱甚至武力挟持的图谋，他针锋相对、步步为营，不仅打破了齐国的图谋，还迫使齐国归还了从鲁国侵占的3处土地，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孔子的明辨是非善恶就是儒家讲的直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反对没有底线的盲目善良、没有原则的一味忍让。

明义利之辨。孔子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是在孔子那里，义和利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孔子重义，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时，孔子并不排斥利，他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明义利当前如何取舍？答案就在于“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贵，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求得富贵、摆脱贫贱都要遵循道义原则。《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的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

孔子的处世学问

□ 王 雪



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子贡赎人而不取赏金，看似高风亮节，实则不利于社会风尚的塑造；相反，子路拯溺而受牛，既体现了自己的仁爱之心，同时也能鼓励他人见义勇为。所以，在孔子看来，对于利，取或不取要以义为标准，若取之有利于公序良俗、民生福祉，则当取。

践中庸之德。这是孔子行事的重要原则，也是孔子眼中德的至高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描述君子之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突出不偏不倚，中正适度，这都是中庸之德的体现。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为什么能做到中庸？原因在于其知晓时中之理。中庸作为一种行事方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审时度势，因时因势变通。孟子之所以称颂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因为孔子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必”“毋固”正是时中主张的表现。孔子曾一一评价古代圣贤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等，认为他们坚守一端，而自己则不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在孔子看来，“可”与“不可”并不绝对，要因时因事决定。如，孔子重“信”，但“信”与“不信”没有绝对化。“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在孔子看来，制止叛乱是大义，与蒲人的盟约是小信，为求大义，不得已可失小信。这就是孔子说的“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也是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践行诺言要分情况，没有远大的眼光与气度，只知一味死守原则而不知变通的人不能算是具备中庸之德的君子。